

JIN SHA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JIN SHA

金沙

(修订本)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沙：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2版 (修订本).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 978-7-220-07309-0

I. 金... II. 成... III. 巴蜀文化—文化遗址—考古发现—成都市 IV. K872.7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2215号

JINSHA

金沙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修订本)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策 划

张问渔

责任编辑

张问渔

封面设计

魏晓舸

内页设计

宁成春

封面书题

邓代昆

电脑制作

1802工作室

责任校对

叶 勇

印刷监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661236 86650010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制版印刷

深圳市森广源 (印刷)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8

版 次

2005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二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220-07309-0

定 价

118.00 元

■ 著作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录



金沙遗址发掘地点分布图 .. 1		
壹·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4	
大型建筑基址区	5	
宗教祭祀活动区	5	
一般居址区	6	
墓地	7	
贰·遗址的年代与性质	8	
叁·出土文物概论	11	
金器	11	
青铜器	13	
玉器	16	
石器	19	
肆·出土文物介绍	23	
1. 金面具	23	
2. 金冠带	24	
3. 金鱼纹带	25	
4. “太阳神鸟”金饰	26	
5. 蛙形金器	27	
6. 鱼形金饰	27	
7. 三角形金器	28	
8. 金盒	28	
9. 圆形金器	29	
10. 喇叭形金器	29	
11. “几”字形金器	30	
12. 铜带柄有领璧形器	30	
13. 铜有领璧形器	31	
14. 铜有领璧形器	31	
15. 铜环	32	
16. 铜圆角方孔形器	32	
17. 铜圆角方孔形器	33	
18. 铜戈	33	
19. 铜戈	34	
20. 铜戈	34	
21. 铜璋	35	
22. 铜铃	35	
23. 铜铃	35	
24. 铜多边形挂饰	36	
25. 铜圆形挂饰	36	
26. 铜圆角方形挂饰	36	
27. 铜立人	37	
28. 铜人头	38	
29. 铜眼睛形器	38	
30. 铜眼睛形器	39	
31. 铜眼泡	39	
32. 铜鸟	40	
33. 铜鸟	40	
34. 铜龙形器	41	
35. 铜牛首	41	
36. 铜虎	42	
37. 铜兽首提梁饰件	42	
38. 铜螺形器	43	
39. 铜喇叭形器	43	
40. 十节长琮	44	
41. 素面玉琮	45	
42. 素面玉琮	45	
43. 四节玉琮	46	
44. 素面玉琮	47	
45. 素面玉琮	47	
46. 玉有领璧	48	
47. 玉有领牙璧	49	
48. 玉有领璧	50	
49. 玉有领璧	50	
50. 玉有领璧	51	
51. 玉有领璧	51	
52. 玉有领璧	52	
53. 玉无领璧	53	
54. 玉无领璧	53	
55. 玉有领璧	54	
56. 玉无领璧	56	
57. 玉玦	56	
58. 玉无领牙璧	56	
59. 玉璋	57	
60. 玉璋	58	
61. 玉璋	58	
62. 玉璋	60	
63. 玉璋	61	
64. 小型玉璋	61	
65. 玉璋	62	
66. 玉璋	63	
67. 玉璋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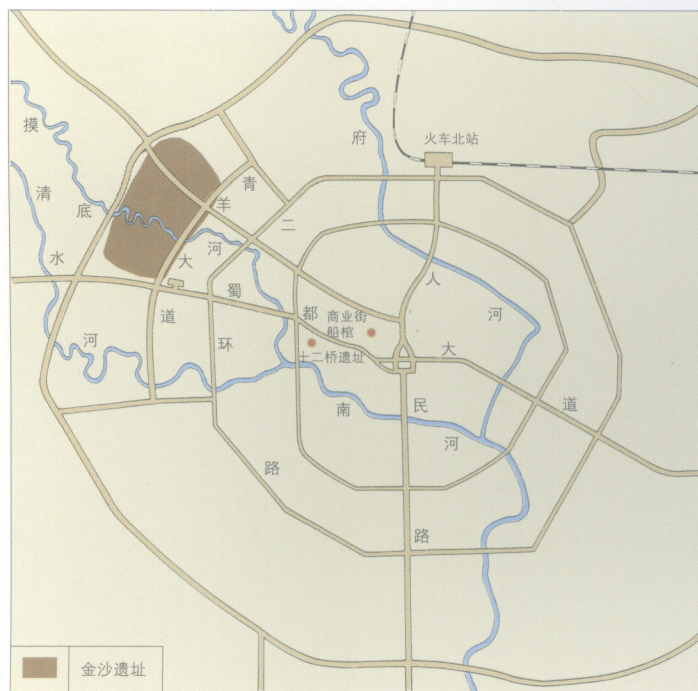
68. 刻纹玉璋	65	96. 玉凿	84	124. 奇石	102
69. 玉璋	66	97. 玉凿	84	125. 玉磨石	102
70. 玉璋	67	98. 玉凿	85	126. 玉磨石	103
71. 玉圭	68	99. 玉凿	85	127. 玉磨石	103
72. 玉戈	69	100. 玉凿	86	128. 特殊玉器	104
73. 玉戈	70	101. 凹刃玉凿	86	129. 玉磨石	104
74. 玉戈	70	102. 凹刃玉凿	87	130. 玉磨石	105
75. 玉戈	71	103. 凹刃玉凿	87	131. 玉磨石	105
76. 玉戈	72	104. 凹刃玉凿	88	132. 玉磨石	106
77. 玉戈	72	105. 凹刃玉凿	89	133. 美石	106
78. 玉戈	73	106. 凹刃玉凿	90	134. 石璋	107
79. 兽面纹玉钺	74	107. 凹刃玉凿	92	135. 石矛	107
80. 玉钺	75	108. 凹刃玉凿	92	136. 石钺	108
81. 玉钺	76	109. 凹刃玉凿	92	137. 石钺	108
82. 玉矛	77	110. 玉梯形刻槽器	94	138. 石钺	109
83. 玉矛	77	111. 玉人面像	96	139. 石饼形器	109
84. 玉矛	78	112. 玉贝形佩饰	96	140. 石跪坐人像	110
85. 玉矛	78	113. 玉椭圆形器	97	141. 石跪坐人像	111
86. 玉刀	79	114. 阳刻昆虫类动物纹玉片	97	142. 石跪坐人像	112
87. 玉斧	79	115. 玉箍形器	98	143. 石跪坐人像	113
88. 玉铎	80	116. 玉饰件	98	144. 石跪坐人像	114
89. 玉铎	80	117. 玉镯	99	145. 石虎	115
90. 玉铎	81	118. 玉镯	99	146. 石虎	116
91. 玉凿	81	119. 绿松石珠	100	147. 石蛇	117
92. 玉凿	82	120. 绿松石珠	100	148. 石蛇	117
93. 玉凿	82	121. 玛瑙珠	100	149. 石鳖	118
94. 玉凿	83	122. 美石	101	150. 木雕彩绘神人头像	119
95. 玉凿	83	123. 玉环	101	151. 木耜	120

金沙遗址发掘地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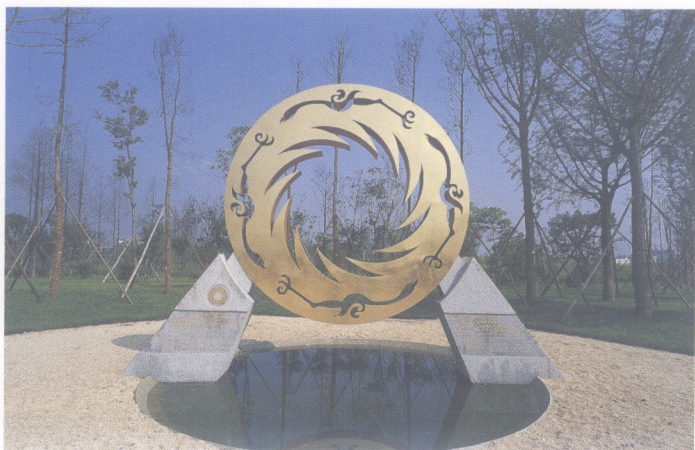
0 130m



成都地理位置图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成都市区的西北部，地处成都市西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北纬 $30^{\circ}41'$ ，东经 104° 。东距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其范围北达羊西线，东临同和路和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清江中路和西路。遗址范围内地势平坦，起伏较小，西北高，东南低，相对高差不到5米，海拔高度为504~508米。摸底河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由西向东横穿遗址中部，然后流向东南，在青羊宫附近汇入清水河。该遗址的东南面有十二桥、抚琴小区、方池街、指挥街等遗址组成的绵延10余公里的商周遗址群，东北相距约8公里为1954年发掘的羊子山土台遗址，往北约38公里是著名的广汉三星堆遗址。



“太阳神鸟”雕塑



遗迹馆东侧

遗迹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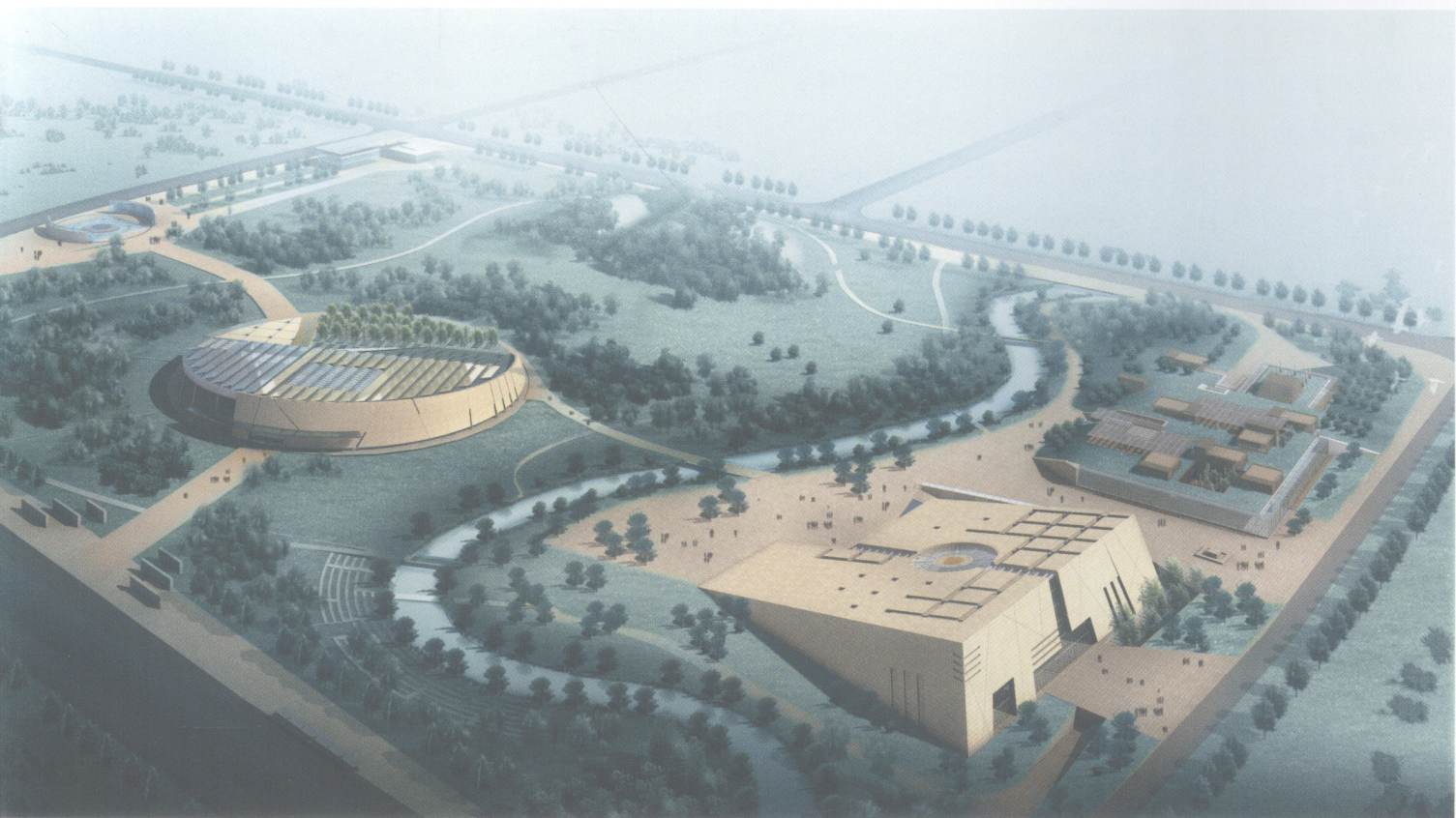
金沙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陈列馆效果图

金沙遗址博物馆规划图



壹

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金沙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早在1995~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该遗址范围内黄忠小区的“三合花园”、“金都花园”等地点进行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大型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遗存，其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陶尖底盏、尖底杯、圈足罐、高领罐、簋形器等为代表，性质为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的“十二桥文化”，时代约当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当时的发现主要集中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因此将其定名为“黄忠村遗址”。

2001年2月初，一建筑公司在摸底河南岸的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一组开挖小区下水管道，在施工中发现了大量象牙、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珍贵文物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力，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大面积的勘探与发掘。并开始把金沙村的遗存与黄忠村遗址联系

起来，认识到它们应是同一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考虑到发现大量珍贵文物的金沙村地点特别引人关注，便把包括黄忠村在内的整个遗址命名为“金沙遗址”。自2001年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遗址范围内的“兰苑”、“金沙园”、“燕莎庭院”、“将王府邸”、“芙蓉苑”、“博雅庭韵”、“春雨花间”等20多个地点（均为商住小区的命名）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已近10万平方米，初步了解了遗址的分布情况、年代、文化内涵与性质。

目前能确认的金沙遗址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主要分布于青羊区金沙村、龙咀村和金牛区的黄忠村、红色村、郎家村等。遗址内已发现的重要遗存主要有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

金沙遗址保护区全景



大型建筑基址区

位于摸底河以北的黄忠村“三合花园”地点，在该区域共发现房址17座、窑址17座、灰坑300余个、墓葬13座等重要遗迹。该区域房屋的修建相当考究，墙体是挖基槽埋柱子的木骨泥墙式结构，基槽宽约0.5米，槽内小的木骨洞排列规整而密集，大柱洞间距约1.4~1.5米，其中有5座房址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布局很有规律，可能为同时期的一组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宽近8米，揭露长度54.8米。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

宗教祭祀活动区

宗教祭祀活动区主要发现于金沙村“梅苑”地点的东北部，该区域与黄忠村“三合花园”的大型建筑区相距摸底河约800米。2001年2月9日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区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现已发现26处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以及象牙1000余根，还有数以千计的野猪獠牙、鹿角等。现已揭露的可以确认的祭祀遗迹有地面掩埋和土坑掩埋两种形式，依据出土遗物的不同可分6类不同情况。

(1) 以玉器、铜器为主的堆积及以玉器、石器或玉器与金器伴出的堆积。这类遗迹现象较多，主要为地面掩埋的形式。这种现象从第7层下至第12层下都有发现。遗物以玉器、铜器、金器、石器为主。

出土最大的一片卜骨



“梅苑”祭祀活动区发掘全景

(2) 象牙为主的堆积。其中一号坑边长1.6米，残宽0.6米，清理厚度0.8米，是以象牙为主的堆积坑。由于机械施工破坏，仅存坑的一角，原坑形制不明。坑的上层全部堆积象牙，从断面看多达8层，长1.2~1.6米，放置的方向一致，极有规律。坑下层为玉器、铜器等物，由于未发掘至底部，玉器、铜器数量不明。11号祭祀遗存位于一号坑的北部，与一号坑相距2米，分布范围长2.5米，宽1米，厚1.3米，出土象牙15根，象牙器12件，出土

一号象牙坑





“三合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全景图

镶嵌玉片的漆器和木胎虎头漆器各1件，最大的象牙长1.8米。1号祭祀遗存为地面掩埋，分布范围长2.5米，宽1.2米，面积3平方米，正中为一根大象牙，长1.4米，四周有排列规整的獠牙28枚。

(3) 象牙玉器堆积。其中编号为10号的祭祀遗存，分布范围长1.5米，宽1米，面积1.5平方米。堆积分为两层，上层为象牙，下层为玉器。

(4) 石璧、石饼形器、石璋堆积。位于祭祀区的南部，分布范围东西长19米，南北宽14米，面积近300平方米，出土有大量大、中、小型石璧、石饼形器及一些石璋。石璧大多数为砂岩，器体较薄。石璋一般只有器身部分，而无柄部。石璧和石饼形器均为西北—东南向倾斜放置，层层叠压，呈扇形、环状分布。这与成都平原的地势和河流、墓葬方向一致，尚不清楚是否具有特殊的含义。石璋放置在石璧旁边或下部，摆放并无规律。在该区内尚未发现与加工石器的作坊有关的余料、废芯及作坊遗迹等现象。这一区域的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

(5) 野猪獠牙、鹿角堆积。位于该区的北部，为地面掩埋，分布范围东西长28米，南北宽18米，面积近500平方米。主要以野猪獠牙、鹿角为主，还有少量象牙、玉器、美石、陶器等。野猪獠牙上千枚，鹿角上千根。

(6) 卜甲埋藏区。位于该区的西部，共发现大、小卜甲19片，其中一片长46.4厘米。

上述各类遗迹年代跨度从商代晚期延续至春秋。目前在“梅苑”地点内已出土了近5000件金器、铜器、玉器、

石器、石器等礼仪性用器，还发现了大量的象牙、卜甲等，这些器物在其他区域极少发现。从器物的质地与等级分析，遗迹内出土的这些文物均极为珍贵，又无使用痕迹，应不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能享有如此众多的珍贵器物。这些器物的大量埋藏可能与当时的宗教礼仪活动有关。

一般居址区

一般居址区位于金沙村的“兰苑”、“金沙国际”、“博雅庭韵”等地点内，分布较广，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目前，已发现房址数十座、窑址100座、灰坑近2000个、墓葬近700座。居址区内通常有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等遗迹。房址基本上为西北—东南向，构筑方式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即在地面上挖一浅沟，沟内埋密集的木棍或圆竹，然后抹草拌泥，经火烘烤成红烧土墙，其上盖顶(草顶)。这类房屋的面积不大，多在20平方米左右。由于没有直径较大的木柱的支撑，容易垮塌，重建的次数较多。考古发掘时我们只能看到沟内密集の木(竹)骨洞。在居址区房屋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灰坑，坑中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及大量石器。其中有些灰坑非常规则，成排分布，内置一些形体较大的陶器，有的坑中还埋藏有大量完整的陶器，有的坑中夹杂有大量的草木灰。陶窑均为小型的馒头窑，其结构很简单，主要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几部分组成，多呈前低后高的斜坡状。目前，最大的居址区发现于遗址西南部的“兰苑”地点。

“燕莎庭院”地点发掘全景



墓地

金沙遗址居址区的附近已发现了1000余座墓葬，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这些墓葬大多数是在居址区废弃之后形成的，因此墓葬大多打破居址。各墓区内都有一定的规划，排列有序。以“燕莎庭院”地点的墓地规模最大。墓

葬均为西北—东南向，头向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墓葬分一次葬和二次葬，盛行二次葬。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也有少量俯身葬和屈肢葬，还有的死者双手抱于胸前。约半数的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数量也不多，一般随葬的为陶器和石器，极个别的也有一定数量的铜器和玉器。从目前已发掘的墓葬情况看，随葬品规格、数量、等级都不算高，但仍可看出当时的社会有明显的分层与等级划分。

“兰苑”地点发掘全景



武

遗址的年代与性质

金沙

再现辉煌的古蜀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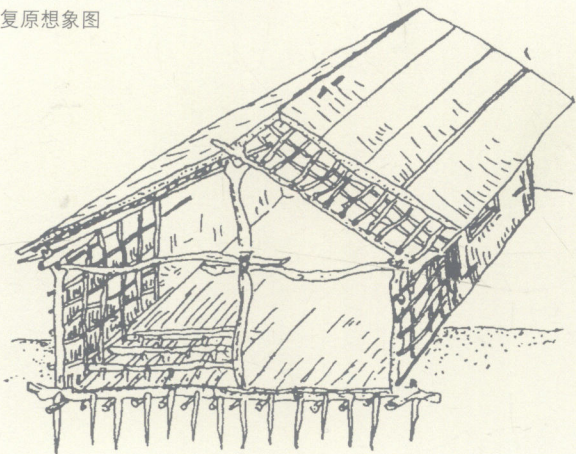
过去有关古蜀的历史我们主要是通过文献记载了解到一些片断。《华阳国志·蜀志》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这些文献记载多带有传说的性质，让人半信半疑，因此唐朝大诗人李白也不得不感叹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随着近年一些考古发现与研究，从考古学上已建立起了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青铜文化连续发展的古蜀文化编年序列，证实了成都平原确实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过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曾产生过具有独特风貌的古蜀文明，存在过强大的古蜀王国，那些悠久的传说看来也不是古人向壁虚构。

1996~2001年，成都平原的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郫县三道堰古城、崇州双河、紫竹古城、大邑盐店、高山古城等八大史前古城被先后发掘，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历史面貌有了初步的认识。学术界把这一阶段称为“宝墩文化”时期。宝墩文化约当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至夏代前期，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至前1700年。近年还发现了大量不带夯土墙的小型村落。这些城址分别散落在成都平原的西部或西南部，相距约20~40公里，面积10万~60万平方米，大多位于河流附近的台地上，其形状以长方形、方形为主，也有多边形和双重

城垣略呈回字形的，有的城址还发现有城壕。现在宝墩古城还保存着高近5米左右，宽达20米的城垣，其他几处城址也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通过考古发掘表明这些城墙主要是用堆筑方法构筑而成。宝墩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以长方形的木（竹）骨泥墙为主，也有少量的干栏式建筑。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不同遗址其墓葬的随葬品也有所不同，但数量不多。宝墩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小型的石器，多为通体磨制，以梯形石斧、梯形镞、两端有刃的凿为主。陶器制作是泥条盘筑加慢轮修整，颜色以夹砂灰陶、外褐内灰陶、泥质灰白陶、灰黄陶为主，纹饰以绳纹、划纹、戳印纹、附加堆纹为主。以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和壶等为典型的陶器群。宝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近两年在三星堆遗址中部的月亮湾台地所发现的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证实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

三星堆文化经过几十年的长期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也日益清晰。三星堆文化约当夏商时期，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700年至前1150年。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仍以长方形的木骨泥墙为主，生产工具多为通体磨制的小型石器，有平面呈梯形的石斧、镞和长条形的石凿及半月形的弧背石刀等，石纺轮通常利用石璧钻下的石芯再穿孔加工而成，穿孔有琢钻和管钻两种。陶质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网坠。陶器中夹砂陶占绝大多数，夹砂褐陶是最主要的陶系。纹饰不发达，以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几何形纹等为主。典型陶器有小平底罐、高柄豆、盃、鸟头把勺、

十二桥遗址“干栏式木构建筑”
复原想象图



壶、瓶、觚、圈足盘、鬲形器、器盖等。有学者指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面貌的一种考古学文化^[1]。这时的成都平原已不再是城址林立，三星堆城已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心城邑，城址的面积近3平方公里，三星堆文化的分布从成都平原遍布整个四川盆地，并东达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范围极广。从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器物坑中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及象牙等珍贵文物来看，多为当时上层社会的祭祀用器，尤其是青铜器数量巨大，造型非常奇特，可看出三星堆社会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社会的分工也很明显，具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三星堆已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到三星堆遗址四期之时，二、三期文化中那些典型的陶器开始消失，出现了风格迥然不同的尖底类陶器，这种以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等为特色的文化是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的主要特征。目前已有学者建议把原来的三星堆遗址分成三个文化阶段，并分别加以命名，即把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划为宝墩文化，二、三期文化定为三星堆文化，四期则归为十二桥文化^[2]。

十二桥文化是四川盆地青铜时代中期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春秋，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至前600年。十二桥文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成都市区十二桥遗址的发掘开始逐步被认识的。该遗址发现了大型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大量的尖底陶器，以及卜甲等，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完全不同。随后的几年又在十二桥附近由西向东分别发掘了抚琴小区、方池街、君平街、指



陶尖底杯

挥街、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遗址，这些遗址绵延10余公里，彼此相距不远，文化面貌也极其相似，其中以十二桥遗址发掘时间早、面积较大、出土遗物最多且最具典型性，因此把这些遗址统称为十二桥商周遗址群。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也发现文化面貌与之接近的古文化遗存，如雅安沙溪遗址、汉源麻家山遗址、阆中坪上遗址等。十二桥文化时期的房屋建筑主要发现的有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木（竹）骨泥墙建筑两种形式。石质生产工具仍然以通体磨制的小型斧、镑、凿为主，另外还存有大量的不知用途的石盘状器。骨器很多，有笄、针、锥、镞等，均磨制。铜器过去发现有细长条形的凿和方锥状的铤、带脊、两翼倒刺的镞以及最原始的柳叶形剑。卜甲的多见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特征，明显是受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一般多为龟腹甲，有圆钻无凿和圆钻方凿等形式。陶制生产工具以纺轮数量较多，网坠较少，陶器以夹砂褐陶、灰陶为主。纹饰少见，其中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的重菱纹、鸟纹、弦纹、附加堆纹和圆圈纹等。典型陶器有尖底杯、尖底罐、尖底盏、盆、圈足罐、高领罐、喇叭口罐、瓮、釜和纽呈8字形、三花瓣形的器盖等。

目前从金沙遗址的发掘情况看，其局部区域，如“金沙园”、“将王府邸”、“三合花园”等地的下层发现有宝墩文化遗存，“燕莎庭院”的上层发现有少量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主体遗存是以陶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瓮、高柄杯形器、喇叭口罐等为代表，其陶器群为十二桥文化的典型特征，其主体文化当属十二桥文化，初期阶段还残存大量三星堆文化因素的陶器，如小平底罐、

[1] 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研究·导论》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2] 孙华：《试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分期》载《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第65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江章华、王毅、张肇：《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赵殿增、陈德安：《三星堆发掘与研究》，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陶高领罐

陶盃



陶盃、瓶、高柄豆等。金沙遗址的文化堆积年代约当商代晚期至春秋，以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遗存最丰富。根据目前阶段性的发掘资料，我们认为金沙遗址内应有一定的规划和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现已发现金沙遗址内有大型建筑基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一般居址区、墓地等多处重要遗存，每一区内又都具有一定的布局结构，而且出土了大量的礼仪性用器和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特殊遗迹现象，这些都是一般聚落所无法比拟的。从金沙遗址的规模与等级来看，是目前十二桥文化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遗址，应是十二桥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聚落，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从金沙遗址祭祀区域出土的大量祭祀用器分析，其内容和面貌与三星堆遗址内出土的祭祀用器有较多的相似性，金沙时期仍继承了大量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宗教信仰与祭祀传统，如对太阳的崇拜、鸟的崇拜、鱼的

崇拜等，与三星堆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传承关系。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

如果说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发现与发掘为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找到了线索，那么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又为我们寻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去向。金沙遗址对于先秦时期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立和完善，深入探索三星堆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古蜀文明的历史框架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正在一层层地搭建，古蜀文化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战国青铜文化四次大的发展与变化。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古蜀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将会日渐清晰。目前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新的资料与线索可能正引导着我们一步步地走近古蜀历史的真实。



陶圈足罐



陶尖底盏



陶喇叭口罐

叁

出土文物概论

金沙遗址大型祭祀活动区内现已出土了 5000 余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及大量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这些璀璨夺目、美轮美奂、富有神秘色彩的器物，大多数可能是上层统治者祭祀天地山川、祖先神灵、祈福驱邪的祭祀礼仪用品。

金 器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金器 200 余件，均出自于“梅苑”地点的东北部，其数量与种类已超过中原地区和三星堆遗址，为中国商周时期金器发现之最。种类以金箔、金片类器物为主，器形有人面具、冠带、“太阳神鸟”金饰、人面形饰、鱼纹带、蛙形器、鱼形器、盒、喇叭形器、三角形器、“几”字形器、条形器、圆形箔饰以及大量的金片等。

金沙遗址出土的个别金器经过无损检测明确了表面的合金成分，在显微镜下观察纹饰的工艺痕迹推断出其制作方法，通过取样进行金相检验和成分分析，确定其合金成分和加工工艺^[1]。从实验分析的结果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一般厚度在 0.1~0.2 毫米，个别的有 0.4 毫米左右。经过对其中 4 件残片做的金相检验，表明这些金箔或金片均为热锻成型。这些金器的无损分析和残片的制样分析表明，其含金量在 83.3%~94.2% 之间，可能均为自然金加工而成。对部分金器表面、表面纹饰线条的加工痕迹及特征所进行的显微镜观察和分析表明，其纹饰多为刻

画。其中镂空的纹饰（主要是“太阳神鸟”金饰）是用某种工具反复刻画，由于切割工具不十分锋利，加上纹饰图案的镂空要进行反复的刻画，而且每次不可能与上次的线条完全重合，以致留下多次画痕，同时由于反复用力，造成了镂空处边缘的褶皱和边缘线条的不流畅。大部分金器在加工成型后，并未对其表面进行处理，而是根据需要选择地对个别器物的表面进行抛光，以使其光亮。通过对金沙村金器的实物观察，我们发现其金器制作还采用了锤揲、剪切、打磨、篆刻、模冲等多种手法，一些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许多器物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黄金工艺技术的代表之作。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与三星堆遗址应是一脉相承，但其种类却更为丰富，工艺技术也更为精湛。

黄金工艺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并不发达，人物造型的黄金像设或器具更为罕见。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造型风格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金人面罩和贴金铜人头像虽然有所区别，却与三星堆出土的个别青铜人像和金沙村同时出土的铜立人像面部形态相像，造型更为小巧精致。这件人面具可能与三星堆金面罩一样是包贴于青铜人面像上的，但也不能排除它成形后尚未覆盖在铜人头或其他材质（如木质）头像上的可能。这类金面具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文化中几乎不见，应当是四川盆地青铜文化所具有的典型性因素之一。

金沙遗址金带上的纹饰与三星堆器物坑金杖上的纹饰基本相同，都是以鸟、鱼、箭、人头为主要构图。金带与金杖均可能是当时古国古族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与代

[1] 肖磷、杨军昌、韩汝珍：《成都金沙遗址出土金属器的实验分析与研究》，载《文物》2004 年 4 期。



考古工作人员在现场对象牙进行保护工作

表,可能二者器表上基本相同的纹饰也应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这反映出了金沙村与三星堆之间内在的联系。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图案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神鸟的强烈崇拜,也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太阳神鸟”金饰与蛙形金器均很薄,单独使用的可能性较小,应当是粘贴于其他质料的器物之上作为装饰。蛙形金器现已出土8件,根据考古学材料的对比,太阳与蛙(蟾蜍)常常在中国南方青铜鼓面上以组合图案出现,因此不排除它们组合在一起使用的可能。

金沙遗址金器也有与别的地方不同的内容与纹饰。其中金盒是目前国内见到的最早的金质容器,三角形金器、“几”字形金器、喇叭形金器等也都是首次出土,是金器类型中的新品种。鱼纹金带上的鱼纹非常独特,其长喙的鸟头和鱼体相结合的形象比较凶猛,与金带和金杖纹饰中温驯的鱼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世界上最早出现黄金的地区是北非的埃及,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拜达里(Badri)文化中,就已经有了黄金器具,稍后在西亚的两河流域、欧洲地中海沿岸和中亚地区也出现了黄金制品。根据目前的考古学材料,中国的金器最早出现于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器形为“鼻



喇叭形金器

饮”和齐头合缝的金耳环,其年代大约在夏代,相当于齐家文化的后期^[1]。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在商代之际,此时的黄金制品可分为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一个是西北和北方草原系统,一个是中原和西南地区^[2]。比较集中的是在后一个系统中。西北及北方地区是将金作为装点身体的饰件来使用,主要器形有金耳环、金臂钏、金笄、弓形饰、金头饰等。中原地区则是以金片和金箔为主,大多发现于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等遗址和墓葬中,墓葬的主人多为王侯,可见当时的金器基本为上层人士所使用。西南地区发现的黄金制品则集中于四川地区成都平原,过去主要发现于广汉三星堆遗址,以金片和金箔为主,器形有金杖、金面罩、虎形金箔饰、璋形金箔饰、鱼形金箔饰、金箔带饰、圆形金箔饰、四叉形器、金箔残片等。

有学者曾认为三星堆的金杖、金面具等文化形式,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西南夷道、蜀身毒道、滇缅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3]。也有学者认为在西北及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金器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别,一方面可解释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考虑黄金工艺传统不同这一因素^[4]。目前在成都平原尚未发现采用青铜铸造工艺,用范铸法制成的金器,也没有发现用黄金制成的首饰一类的器物,成都平原金器工